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日本近代批判與“奴才論”的觀點：竹內好與兩個魯迅

Critique of Japanese Modernity and the View of "on Slavery":
TAKEUCHI Yoshimi and Two Lu Xuns

doi:10.6752/JCS.200806/SP_(6).0003

文化研究, (6_S),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_S), 2008

作者/Author：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賴俐欣(Li-Shin Lai)

頁數/Page：19-3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3](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亞洲作為抵抗線的問題意識

《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19-31

日本近代批判與「奴才論」的觀點： 竹內好與兩個魯迅*

Critique of Japanese Modernity and the View of
“On Slavery”: TAKEUCHI Yoshimi and Two Lu Xuns

子安宣邦

KOYASU Nobukuni

大阪大學名譽教授

賴俐欣 翻譯

Li-Shin Lai

輔仁大學日文系碩士

也就是說不得不體驗自己身為奴才的自覺狀態，
並且不得不忍受這樣的恐怖。
這種國粹或是日本，是放逐歐洲，
而非放逐承載著歐洲的奴才構造。
——竹內好，〈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

一、歐洲的自我運動

「正因為歐洲是歐洲，所以不得不侵略東洋。這是歐洲伴隨著自我解放時必然的命運。碰撞上異質的事物時反而能夠確認自我的

* 本篇由子安宣邦教授及日文版發行單位青土社同意授權，出自子安宣邦新著：《「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何謂「近代的超克」），東京：青土社，2008。本篇為第9章〈日本近代批判と《ドレイ論》の視座：竹內好と二つの魯迅〉，頁165-185。本文內所有註腳均為譯註。

存在。」竹內好在1948年——接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日本戰敗後——如此說道。這句話出自於〈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以魯迅為線索〉為題的論述之中。這個論述使得歐洲得以在世界史運動的前進中自我實現並自我確認，以及與此抵抗的東洋其身為東洋的自我確認能夠成立，並顯示了二次大戰後竹內對於以歐洲為中心的近代世界的精闢洞察。竹內在此乃是環繞著歐洲的理性主義信念而論述的。歐洲自我實現的運動便是侵略東洋，這個侵略東洋的行為，使東洋產生抵抗，而這個抵抗也反射到歐洲去。但是，「即使這樣，究極地來說，也無法動搖能夠將所有事物客體化以分析萃取出來這樣徹底的理性主義信念。」

竹內所說的理性主義，其意義是包含了根據分析性的、認知上的理性將所有事物客體化的認識衝動，以及化理性為知識，將該客體納為已有的征服衝動這兩者的知性運動。因此竹內也說了，「對我來說，能將所有事物分析萃取出來的理性主義信念是很可怕的。與其說是理性主義的信念，不如說使該信念成立的理性主義背後隱藏的非理性意志的壓力是可怕的。」這個認識衝動或是征服衝動讓近代歐洲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也就是中國學(Sinology)或日本學(Japanology)得以成立。當然近代日本也擁有了這種理性主義的認識衝動與征服衝動，所以日本的東方主義也因應而生。竹內本身從這個部分學習，卻漸漸脫離，最後終於感到嫌惡的「中國學」，也是在近代日本中以日本東方主義之型態而成立的。日本的東方主義不僅是對於中國古典文獻世界展現出認識與征服衝動而已，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同樣是近代日本的社會科學等領域中作為認知對象的世界。以竹內的方式來說，帝國日本侵略中國的這個自我運動，亦為根據日本的學識而成的理性主義認識運動下的侵略中國行為。

但是我現在從竹內提及關於伴隨歐洲的自我實現運動而來，理性主義的、知識擴張的欲求開始寫起，是我接觸到竹內好最近成為〈歐洲日本學的認知對象〉這篇報導所引發的。竹內批判在歐洲的知識背後隱藏了征服的認識衝動，但是卻成為現今歐洲日本學的研究對象，實在是相當奇妙的現象。2004年9月德國海德堡大學舉辦了以竹

內好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受邀為這場研討會講者的松本健一¹，很快地就在報紙上投稿發表，報導了此事。之後，同樣也是受邀參加該研討會的加加美光行²等人舉辦了日本版的竹內研討會（愛知大學，2006年），此研討會的論文集《超越無根的國族主義——重新思考竹內好》也於2007年出版發行。松本在報紙上稱道，在德國一連5天、世界首次舉辦的「竹內好國際研討會」有其劃時代性。加加美也同樣寫道，參加這場研討會深深地感到相當幸福。根據松本所言，這場德國的竹內研討會揭櫫的正式標題為「竹內好——思考亞洲另一種近代化的思想家？」(Takeuchi Yoshimi – Thinker of a different Modernity in East Asia?)但為何加上一個問號呢？松本跟加加美都沒有對此加以說明。我想這應該不會是「竹內是思考另一種近代化的思想家嗎？」這樣對於標題整體加上的問號吧。而這是正面的詢問「另一種近代化為何？」或是負面的質疑「究竟有無另一種近代化？」，那就不得而知了。抑或這個問號包含了上述對於標體整體的疑問，以及意義含混不清地包含了方才舉出的兩個疑問也不一定。不如將這個問號看作是呈現了歐洲或是德國向竹內好表示其認識關心的實際狀況，也就是像展現出「在日本有位思想家對於脫亞入歐的近代化大唱反調，名叫竹內好，他究竟為何許人也？」如此程度的認識與問題的關心。這既不是由歐洲永無止境的自我擴張之路轉變成表明現代德國的自我反省態度，也不是和冷戰後世界史上的地殼變動有所牽連，以表現出在德國所出現對於亞洲關心的程度。如果是將近代歐洲帝國主義的、學識上的歐洲徹底自我反省的批判運動，以竹內好的觀點來切入的話，那麼我才能說他們「認識竹內」。我在經驗上了解歐洲，特別是德國的東方主義、日本學的實際狀況，關於他們對於亞洲表示認識上的關心這點，我和竹內一樣感到非常懷疑，甚至抱持著否定的態度。

-
- 1 松本健一(1946-)，評論家、作家、思想史家，現任麗澤大學大學院教授，專治日本近代精神史與文化論。
 - 2 加加美光行(1944-)，1967年東京大學文學部社會學科畢業，曾任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現為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

二、竹內好問題

我在此所述的「竹內好問題」，並非前述所言因應國際上的關心而建構出的問題。當然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在國際上的關心中所提出的「竹內好問題」為何，也依然引起我的興趣。因為這能讓我明白現在在日本想將竹內好作為議題探討的人們其思想上關心之所在。這個關心為何，說得白一點的話，就是期待德國的竹內研討會，並且與此呼應，讓竹內好論在日本再度發燒的人們所尋求的「另一種近代，或是亞洲的近代」這樣思想上的關心。但是違反竹內的本意而將旨趣放在實體上的「亞洲的近代」的這些人，關於其思想上的關心，我想用後竹內式的問題來重新省思。而我所說的「竹內好問題」並非如此。

竹內好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昭和10年代時透過魯迅更加深了身為文學家的自我理解。隨後竹內在日本戰敗後的昭和20年代，則藉由魯迅嚴密地檢視亞洲的日本人這樣的自我認知。前者的竹內有《魯迅》一書問世，而後者的竹內則有前述所言的〈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以魯迅為線索〉的論述誕生。竹內將前者的魯迅轉移至戰敗後的日本，設定了針對在戰敗後仍尋求與歐美的近代一致的日本與對日本人其自我意識這個根本性的批判主軸，我將之稱作為「奴才論」的觀點。由這兩個魯迅所構成的「奴才論」的觀點，竹內挖掘出亞洲的日本所欠缺的自立基盤。透過這個觀點，竹內建構出關於二戰後日本最具批判性且最具否定性的言論——「言下之意日本什麼也不是」。竹內由這兩個魯迅所展開的關於二戰後日本的言論及其問題，便是我所謂的「竹內好問題」。

竹內在〈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以魯迅為線索〉中，引用了魯迅的寓言小品〈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³來展開其「奴才論」。這個從魯迅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衍生出來的言論，是顯示了前者

3 在日文中，魯迅的該篇寓言名為「賢人と馬鹿と奴隸」，竹內好則改編為「賢人とバカとドレイ」，在此中文統一為〈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的魯迅在後者，也就是關於昭和20年代二戰後日本的論述中如何再生的重要事例。魯迅的這篇寓言，現今仍是竹內針對繼續作亞洲的優等生的日本，構成對其否定的、反諷的脈絡時所不斷引用的。關於優等生日本，竹內如以下論道：

受戰敗的教訓而覺醒的劣等生，應該會學習優等生而學聰明吧。優等生文化應該會興盛吧。日本意識形態沒有失敗，因為它是即使失敗了也能轉化成勝利的優秀精神力量。看看日本文化的優秀之處吧。日本文化萬歲。

竹內所述的亞洲的優等生、劣等生這種文化上優劣的對比，轉移至文明論中進步與退步的對比，這個對比進一步地蘊含了政治上支配與從屬的關係。這對竹內而言，是在主人與奴才這樣極端的對比之下所講述的。構成此一連串修辭學上的對比的前提，無須贅言，即是東與西、亞洲與歐洲這樣地緣政治學上的對比。這樣的對比如前所述，竹內由主人與奴才的對比出發，而引用了魯迅的這篇文章。魯迅的這篇寓言式小品〈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簡單概述如以下所示：

奴才因為工作繁重，總是尋人訴苦。聰明人安慰他：「你總會好起來的。」但是，奴才的生活依舊很痛苦，他接著向傻子去訴苦道不平。「主人給我住的屋子連個窗子都沒有。」「你不會要你的主人開一個窗嗎？」傻子說道。「這怎麼行？」奴才回答道。傻子馬上到奴才家，開始動手砸牆。「先生！你幹什麼？」「我給你打開一個窗洞來。」奴才雖然想制止傻子，但傻子沒聽進去。奴才大聲哭喊求助。其他一群奴才都出來，將傻子趕走。最後主人出來，奴才向主人報告：「有強盜要來毀掉我屋子的牆壁，我先發現了，然後大家一同把他趕走了。」「你不錯。」主人這樣誇獎他。聰明人來慰問奴才時，他說「你先前實在是有先見之明，主人誇獎了我了，我好起來了。」他大有希望似的高興地說。「可不是嘛。」聰明人也大為高興似的回答他。

聰明人只不過是賦予奴才救贖的幻想罷了。聰明人只是將會好起來的幻想，與趕走傻子後奴才意識更為加深但是卻說自己好起來了的奴才分享而已。傻子相信奴才會被救贖而訴諸直接的行動，但是這個行動反而不被奴才認同，殊不知卻帶來讓奴才更安於奴才的狀態中這樣的結果。奴才一方面說自己好起來，其實只是繼續當一個討主人歡心的奴才而已。那麼對於這個奴才而言，魯迅扮演著何種角色呢？

是只不過是賦予幻想的聰明人呢？還是直接行動的傻子呢？還是究竟能否說他兩者都不是呢？但是從不論是哪一種角色都知道奴才違背了自己，否定了自己這點來看，這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乃是包含1920年代的文學家魯迅對自己的諷刺吧！所謂的奴才，是在中國社會中奴才的黑暗狀態，是文學家魯迅不得不碰觸的沈重現實條件。但是對於這個現實的條件來說，文學家的定位為何呢？這才是昭和10年代竹內在《魯迅》中不斷質問的主題。

透過昭和20年代的竹內，在優等生與劣等生，或是主人與奴才這樣的對比下進行日本近代批判的脈絡中，以「奴才論」為主題來檢視魯迅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如何被重新詮釋之前，我們首先必須來看昭和10年代竹內筆下的魯迅。

三、昭和10年代竹內的魯迅

竹內的《魯迅》堪稱名著，但是這本書是否能讓大家都了解魯迅呢？透過這本書，就算了解了竹內詮釋過後的，或者說不得不如此詮釋的魯迅，也不能算是了解魯迅吧！如果說這也無妨的話，那是因為讀者認為透過竹內詮釋過後所解讀到的魯迅才算有意義。昭和10年代的竹內想要解讀魯迅，或是想要探究魯迅的，是在中國那個時期，也就是孫文發動的國民革命在進行、受挫、分裂、混亂的時期，為何魯迅能成為一位文學家這部分。但是，竹內對於魯迅的這個質問，在昭和10年代後期的日本，在不得不面臨徵召至戰地的命運之時，也是竹內對於自己發出的疑問。透過「魯迅是文學家，不管怎樣都是文學家」這句竹內說過的話，我們如同武田泰淳⁴所言，不得不「解讀出當時他的苦衷與決心」。然而，我並不是要主張竹內的《魯迅》想當然爾是他自己的詮釋，進而貶低這本書的價值。倒不如說，我因為竹內這樣的解讀，了解隨之而來的「魯迅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從竹

內的《魯迅》中讀到的既不是魯迅的評論傳記，也不是作品解說，而是透過竹內所解讀到的「文學家魯迅」這個問題。

關於魯迅，竹內說「想要知道其本質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並非是思想、作品或行爲，或是日常生活，或是美學價值，而是想要知道讓以上這些瑣碎的東西付諸可能的某種本質的東西爲何」。對於魯迅及其文學尋求「本質的東西」這樣的問法，是竹內的魯迅論相當特別之處。竹內好就是這樣一位尋求人類本質的文學家、思想家。比方他說，「魯迅文學的根源，是一種可稱之爲無的東西。透過獲得這個根本的自覺，讓他能成爲文學家」，又說，「他不斷地自我成長，但是成長過後的他還是他。也就是說那就是他的根源，而我稱這樣的他爲文學家。」如同竹內的魯迅論所看到的，在二次大戰前的日本中，將人類的本質或是存在的根基、源頭化爲理論的，要不是禪學上的存在論哲學家，就是詩學上的浪漫主義文學家。我在此大膽地將竹內這個重視本質的言論概括式地相提並論，乃是以竹內這種抗拒共享此意向之外的解釋的文章爲前提。重視本質者的言論，其特性就是只容許產生共鳴者再建構，而竹內建構的關於魯迅的言論只允許仿效者反覆的再建構，其例如以下所示：

他的生涯中唯一的時機，他得到文學上的自覺的時機，換句話說，就是得到死亡的自覺的時機爲何時這個問題。

假如絕望也是虛妄的話，人們究竟該何去何從？對絕望感到絕望的人，除了成爲文學家之外別無他法。因爲毫不倚賴外物，毫不靠外物支持，所以非得獲得所有事物不可。

魯迅是文學家，不管怎樣都是文學家。他是啓蒙家，是學者，是政治家，但隨著他是文學家，也就是隨著拋棄以上這些身分，這些身分反而得以顯現。……稱他爲文學家以外別無其他稱呼這種根本的態度，他是有的。

意即魯迅將孫文看作是「永遠的革命家」，也將自己看作是「永遠的革命家」。……沒有失敗的革命不算真的革命，革命成功不是嚷嚷「革命成功！」而已，而是相信革命永遠存在，然後破除「革命尚未成功」的現在。

游離於政治的，不是文學。在政治看見自己的影子，然後藉著破除這個影子，也就是察覺到自己的無力，文學才得以成爲文學。

以上引用的文章，每一段都只不過是反覆改寫的句子，也是拒絕簡單解說的文章。就算或用「絕望」、或用「革命」、或用「政治」來闡述，這些不同的概念都擁有同樣特性。也就是均為反諷的，或說是徹底否定的句子。否定的、反諷的言語表達方式，顯示了發言者重視本質上的**真實**。常以反諷的、否定的，意即以真實為意向來闡述的這段話，是浪漫派的作風。對於竹內來說，這種浪漫派的言語方式終其一生都毫無改變。但是我說竹內的言論是浪漫派，並非是要賦予竹內任何思想上的評價。反而是藉此更明白理解竹內為昭和10年代戰爭時期的日本帶來的文學言論的特性，以及為昭和20年代二戰後的日本帶來的近代批判言論的特性。對於只允許反覆地再建構這樣主觀的、本質意向的言論，我們只有想方設法來應付。

竹內用否定的、反諷的言論，來探尋並且陳述本質上的魯迅、**真實**的魯迅，也就是**文學家**魯迅。那麼竹內以及竹內筆下的魯迅究竟對何者而言是反諷的、否定的呢？革命在進行、受挫、失敗的世界，以及人們瞎起鬨著「成功了」或「失敗了」的現實政治世界，還有在這個世界中仍然被捕捉到的自己的身影，竹內和魯迅反諷地面對著這些事物。和現實政治世界反諷的對立，意指處在將這個世界實際有用的關係一筆勾消的立場，也就是找出自己身為無用者的位置。那就是反諷的文學的，或者說文學家的位置。但是身為反諷的無用者，文學家在面對現實政治世界時，反而會探尋出跟政治世界有根本的、絕對的關係的文學。這樣的文學家，並非現實政治世界中蠢蠢欲動的**虛假之人**，而是**真實之人**。這樣的文學是永遠的革命，是真正的政治，因此乃是真正的文學。特別這樣真正的文學，乃是絕對的政治語言。這和以詩來提倡日本根本上的變革的保田與重郎⁵其浪漫派的語言一致。竹內是這麼說的：

真正的文學，是在政治中破除自己的影子的。意即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是矛盾的互為一體的關係。……真正的文學，並非反對政治，只是唾棄藉著政治來支撐自我的文

5 保田與重郎(1910-1981)，評論家，1935年創辦文藝雜誌《日本浪漫派》，進行傳統主義與文明批判。

學，唾棄不把孫文當作「永遠的革命家」，只把他看成是革命的成功者或失敗者這樣的文學。為何說是唾棄呢？因為這樣相對比的世界是「凝固的世界」，無法自我成長，因此文學家也就不得不死絕了。文學誕生的根基，總是非得被政治包圍不可，這是讓文學這朵花盛開的苛刻的自然條件。

昭和10年代的竹內說了這樣浪漫派的、反諷的發言，進而道出**真實的文學家魯迅**。這樣的文學家魯迅，是在絕望的現實政治世界中一方面否定地保持自己身為無用者的身分，一方面又能成為現實世界中根本的、永續的革命家。這也是竹內在戰爭這個苛刻的日本現實環境中不得不生存下去時，所領悟到的文學家魯迅。竹內將《魯迅》一書的出版交託給武田泰淳後便趕赴戰場，他自己也提到，「在難以保全明天的生命的環境中，我將唯一希望能寫下來的，都盡我的全力寫在這本書了。」

四、昭和20年代竹內的魯迅

竹內撰寫《魯迅》時，並不是將魯迅放在1920年代中國政治與文學的現實狀況之中，反而他是拒絕如此的書寫方式，同時嘗試描繪在絕望的現實下還決心當文學家，這個本質上的魯迅。文學家魯迅摒除了與現實相對的政治上的關連，並視其為虛假，是**真實的魯迅**。但是處在昭和20年代二戰後日本的竹內，將魯迅放在從破產到重建這樣激動的日本現代史的歷史狀況之中，而這是竹內對於日本再度以**虛假的樣貌**重建起來，站在反諷的批判基礎上而論的。我們在此又可以回到魯迅的那篇寓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948年竹內將這篇寓言標記為〈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由此展開他的「奴才論」。「奴才論」如前所言，是以文化上的優等生與劣等生、文明上的進步與落後、政治上的支配與從屬、社會身分上的主人與奴才等一連串的對比為前提，而建構出來的日本近代歷史批判言論，我前面也提過，這一連串的對比是在東與西、亞洲與歐洲這種地緣政治學上的對比為前提之下而言的。日本戰敗，是促使二戰後日

本在地緣政治學上的「東西」論再生的推手。「東西」論是只要日本的近代化為西洋化，就會在近代日本的形成過程中被不斷拿出來熱烈討論的議題。若要是由竹內的立場來說二戰後的「東西」論的話，便是對於二戰後日本非但沒有將戰敗當作日本近代史根本上轉換的最佳時機，而且將原本是西方優等生的日本原封不動的，或者說更加完全地再建構成西洋國家社會這種主流立場，採取否定的言論。「受戰敗的教訓而覺醒的劣等生，應該會學習優等生而學聰明吧。優等生文化應該會興盛吧。日本意識形態沒有失敗……」這段前面引述過的竹內非常辛辣而且揶揄的發言便是從這裡衍生出來的。「東西」論就是在這段揶揄的發言中所看到的，對於與歐洲近代劃上等號的日本近代徹底批判的言論，而竹內藉機再建構的就是魯迅的「奴才論」。而且竹內觀察到不久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及亞洲國族主義的蓬勃興起後，針對二戰後日本，他的「奴才論」的批判性則變得更加激烈。

魯迅的這篇寓言中，奴才不顧聰明人所給予的救贖的幻想，同時排斥傻子的直接行動，繼續當奴才。關於繼續當奴才這點，竹內這麼說道：「奴才抗拒著身為奴才這件事，同時也抗拒著解放的幻想，並且是一個抱著身為奴才的自覺的奴才，這是從『人生中最痛苦的』夢中覺醒時的狀態」。這邊說的「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是魯迅曾說過關於知道就算逃家也無處可走而夢碎的浪子的話。竹內從這篇寓言中的奴才，看到了繼續「抱著身為奴才的自覺」而**覺醒了的奴才**。這是雖然覺醒了，卻忍耐著繼續當奴才的痛苦。竹內將魯迅投射於這個覺醒了的奴才身上：

抱著身為奴才的自覺的奴才，這是從「人生中最痛苦的」夢中覺醒時的狀態，是走投無路卻又不得不走下去，反過來說，正是因為走投無路所以不得不走下去的狀態。他抗拒著自己，同時又抗拒著自己以外的事物。這以魯迅而言，是使魯迅得以成立的絕望的意義。絕望在走到窮途末路，做出抵抗時顯現，而抵抗以絕望的行動證明之姿顯現。以狀態來看是絕望，以運動來看是抵抗。

如上所述，從魯迅的寓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竹內所解讀的覺醒的奴才可以說是相當牽強的解讀，甚至將覺醒的魯迅投射在覺醒的奴才上，是更加牽強。說到這篇寓言中的三個角色和魯迅的關

係，我想三者均可以看作是魯迅吧！而且將這整件事看在眼裡的文學家魯迅還有另一個角色，因此才有包含對於1920年代中國中的自己的嘲諷這樣的寓言誕生吧！但是竹內卻不這麼解讀。「我想不妨把這想成是魯迅書寫關於被點醒的狀態的文章」，竹內如此說道。魯迅的寓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藉由昭和20年代的竹內重新詮釋為新版的寓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在此奴才雖領悟到自己是個奴才，在解放的幻想之中依然沒有失去自我，繼續作自己也就是奴才這個身分，換句話說就是成為決心走到窮途末路的抵抗者，同時魯迅和這個覺醒的奴才的影子互相重疊在一起。以上引用關於竹內所言覺醒的奴才的言論，是針對魯迅所講述的言論。竹內在昭和20年代中，將昭和10年代自己描繪出的本質的、**真實**的存在文學家魯迅，重新塑造處於絕望的現實，卻依然保持自我，依然決心走向窮途末路這樣**真正**的抵抗者。這是虛構的、塑造出來的魯迅，但是竹內需要這樣的魯迅。如同保田在戰後以虛構的「我家田園」作為針對十九世紀近代末期，其文明論戰的據點一樣，竹內在戰後漸漸以虛構的「覺醒的奴才＝魯迅」作為針對歐洲近代與日本近代劃上等號的超克，其思想戰的戰略據點。那麼竹內以此為據點，究竟展開了何種戰爭呢？

五、「奴才論」的近代批判

竹內闡述的「奴才論」這個日本近代批判，如前所述有著東與西這樣地緣政治學上的構造。這個構造是由文化上的優等生與劣等生、文明的進步與後退、政治的支配與從屬、社會身分上的主人與奴才等對比所構成的。而這樣的對比其終極的前提便是歐洲與亞洲。不過前面也提到，竹內將近代世界史當作是歐洲自我擴張的過程，也就是歐洲包圍亞洲以完成世界史的過程。這個歐洲自我擴張的世界史是歐洲勝利的過程，亞洲敗北的過程。但是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歐洲、亞洲之分的。竹內認為，歐洲乃是透過贏過亞洲獲得勝利來認識歐洲的自我，而亞洲透過敗北來認識亞洲本身。這是竹內針對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的獨到洞察。然而亞洲敗北，意味著亞洲歐洲化，因為歐

洲化，亞洲失去了自我。但是亞洲漸漸在敗北的同時，因繼續採取抗拒姿態，仍然能持續保有自我（亞洲）。竹內論道，如果說在以歐洲為主體的世界史的完成上能加上一個變數，那可能就是亞洲的抵抗。「可以看得出來東洋藉由持續的抵抗，一方面以歐洲的東西作為中介，一方面又能超越它並逐漸產生出非歐洲的東西」，竹內在1948年如此提及。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年的事。

竹內站在對於近代世界史的歷史認識的立場上，以「奴才論」建構他日本近代批判的言論。「奴才論」以奴才為其理論的基礎，是徹底否定並加以批判奴性的現有文化與思想的言論。竹內再建構這樣的奴才，並論述「奴才＝魯迅」，在1948年的日本展開其徹底批判日本近代奴性的否定的、反諷的言論。這邊說反諷，是因為這個言論在否定的背後有著偏重真實的意向。「奴才論」這個批判的言論，在理論基礎上包含了在主人與奴才之間的「雇用奴才反而更具奴性」這樣奴性的逆轉，卻也以社會最下層的奴才為基礎，讓理論的否定的批判性更徹底。甚至竹內所設定的「奴才＝魯迅」這個基礎本身就已經透露出事態在本質上逆轉的可能性。覺醒的奴才，是在持續的抵抗之中保持自我的奴才。正是藉由覺醒的奴才這個主體，事態在本質上的變革才變得可能。一方面被客體的主人支配，一方面連自己是奴才都不知道，也就是虛假的主人的這個奴才，顧名思義是有著奴性，喪失自我的奴才。竹內從這裡衍生對於奴性的日本脫亞入歐，追隨歐洲而達成近代，即使戰敗了還變本加厲讓這樣的近代更完整的徹底批判：

日本被灌輸了成為歐洲、成為更好的歐洲才是解脫之道的觀念，也就是嘗試藉由成為奴隸的主人讓自己脫離奴隸的身分。所有解脫的幻想便是由這個運動的方向開始產生。在今天，解放運動本身脫離不了奴性，而這個奴性非常地根深蒂固。……沒嘗過被點醒的痛苦，卻試圖讓對方覺醒。所以不管怎麼努力也無法擁有主體性。……缺乏主體性，是因為自己不是自己的緣故。自己不是自己，是因為自己放棄了作自己。

在這裡竹內說的所謂「自己」，以亞洲來說就是覺悟到自己身為奴才這件事。察覺到這一點，就沒有了抵抗，亞洲的日本這個主體也就不存在了。日本不是亞洲，也不是歐洲。「言下之意日本什麼都不

是」，竹內是這麼說的。竹內的奴才論是日本近代批判的反諷言論，將**什麼也不是**的日本暴露在我們的眼前。

但是日本對亞洲而言究竟為何？就亞洲而言，是持續發動了從九一八事變到日中戰爭結束一共15年戰爭的日本帝國。竹內認為，這樣的日本，除了是未能覺醒的奴才以外什麼都不是。的確這是朝近代日本丟下一記強而有力的徹底否定言論，但是這個否定言論的反諷性，早已顯露出位於被否定的日本的另一側，抵抗的亞洲主體的誕生。竹內的「奴才=魯迅」這個思想的根據，也同樣應該是在觀察到1948年亞洲主體的形成時建構出來的吧！這整件事就是竹內所提出，以這個亞洲主體為前提的歐洲近代的超克問題。如此一來，對於讓毫無自覺的奴性持續再生的二戰後日本而言，所謂「近代的超克」，是否只是隨著戰敗而煙消雲散的虛幻課題呢？